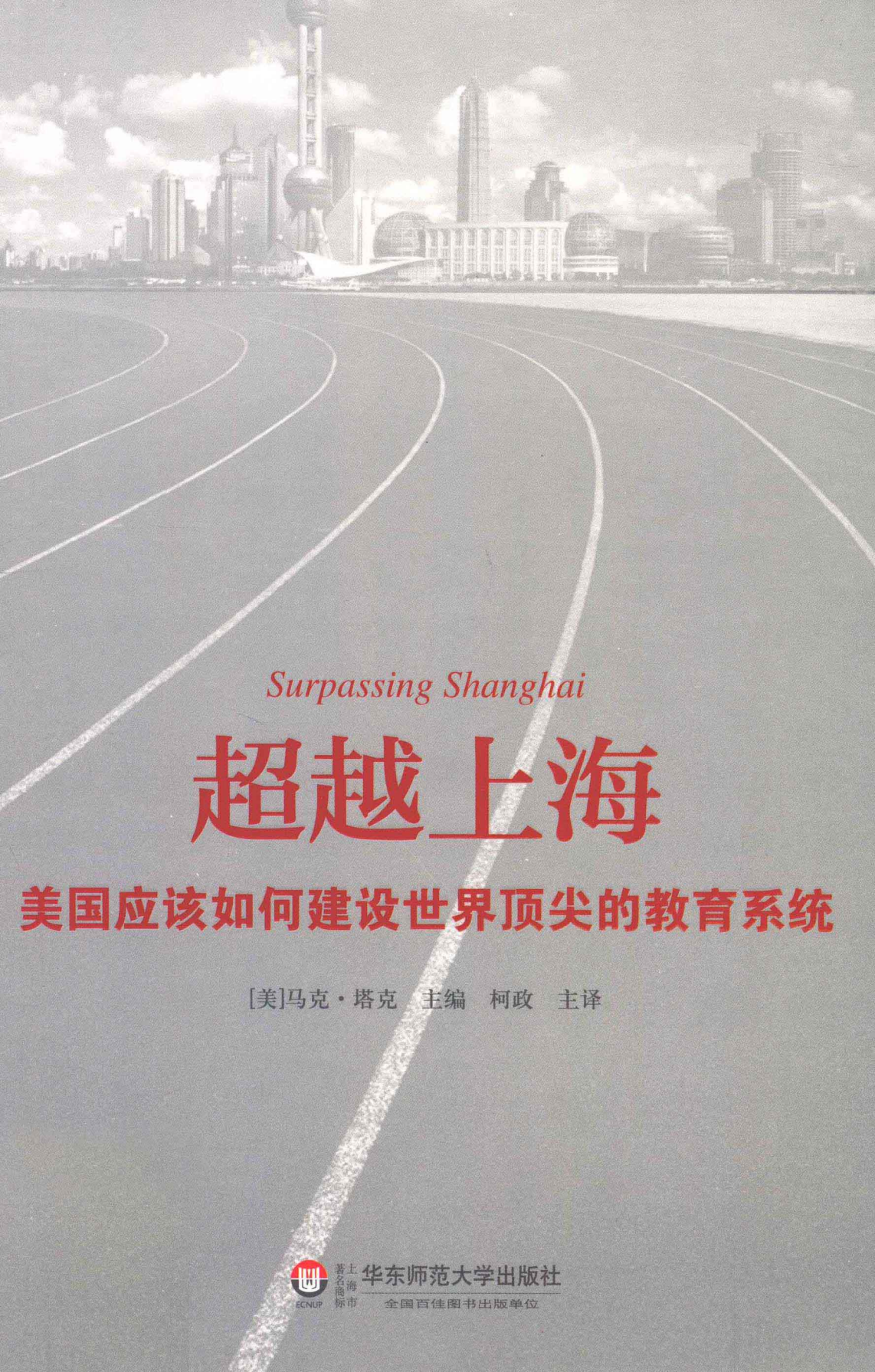




Surpassing Shanghai

超越上海

美国应该如何建设世界顶尖的教育系统

[美]马克·塔克 主编 柯政 主译



上海市
著名商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Surpassing Shanghai

超越上海

美国应该如何建设世界顶尖的教育系统

[美]马克·塔克 主编 柯政 主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上海:美国应该如何建设世界顶尖的教育系统/(美)
塔克主编;柯政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675-0910-8

I. ①超… II. ①塔…②柯… III. ①教育—研究—世界
IV. ①G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7150 号

超越上海

美国应该如何建设世界顶尖的教育系统

主 编 马克·塔克
主 译 柯 政
策划编辑 彭呈军
审读编辑 许环环
责任校对 王丽平
装帧设计 王碧娴 陈军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常熟高专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5
字 数 253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2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0910-8/G·6628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Surpassing Shanghai: An Agenda for American Education Built on the World's Leading Systems

Edited by Marc S. Tucker

Copyright © 2011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s © 2013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Education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2-838 号

序(一)

尹后庆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巡视员,原副主任)

中国(上海)、加拿大(安大略省)、芬兰、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地区)教育为什么那么好?美国教育为什么那么不好?这些国家(地区)教育真的有那么好吗?美国教育真的那么不好吗?……

一系列的问题,在2009年的PISA测试结果公布以后,不停地在美国人的头脑中闪烁。有的美国人认为其他国家的教育只是重点关注部分精英学生,而美国教育却是面向所有人;也有美国人指出,美国有很多移民,大量的学生来自于各种各样语言背景的家庭,所以取得这样一个成绩也是意料之内的;还有美国人提出,美国很多州教育做得很好,如果只安排某个州去参加测试,结果也一定会令人惊奇……

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超级大国足够的理性,在纷繁杂乱的好奇、质疑、叹息式的问题中,人们开始反思。有的认为,美国投入了超越任何国家水平的教育经费,但是用于教师的比例不高,教师对学生的期望也不够高,所以,测试结果不好也许并不奇怪。更有人指出,在结果面前,美国人真正要问的是——如果我们要学习世界最好的教育系统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比世界上现存的都要好的教育系统,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设计?围绕这样一个问题,本书的研究团队选取了五个国家(地区)进行研究,分别是加拿大(重点是介绍安大略省)、中国(重点是介绍上海)、日本、芬兰以及新加坡。加拿大与美国接壤,政治环境也与美国非常类似,但却做得比美国好很多;上海在2009年是第一次正式参加PISA测试,但一下子就成了“明星”,上海提供了一个窗口用以观察一个正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国家在教育领域是如何取得瞩目成就的;日本从PISA测试一开始就位居世界前列并一直保持着;芬兰自参加PISA测试后也一直保持在顶端;新加坡是一个比很多国家的一个城市都要小的国家,但也是一个在教育上从最差之列转移到最好之列的国家。具体分析每一个国家(地区)的案例时,一些共性的要素被列入其中,如国家历史和文化背景的描述,为更好地理解这个国家的教

育系统提供一个大致背景；接下来是教育系统的基本要素的描述，这些基本要素一般包括标准、考试系统、教学系统、学校财务制度、教师素质、入学升级制度、学生动机激励方法等等。这些要素一般被认为是促进教育成功的基本内容。最后，基于对这些要素的分析，研究团队把从上述五个国家（地区）中所学到的，一条一条地与美国做了对照，据此为美国教育政策改革提供计划表。

当然，在我看来，贯穿本书的问题——“如果我们要学习世界最好的教育系统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比世界上现存的都要好的教育系统，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设计”，同样适合其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

2009年，上海作为中国的一个省级地区参加 PISA 测试，第一次参与便获得令世界惊奇甚至质疑的结果。对此，上海始终保持足够的理性。因为我们最初决定参加 PISA 测试时，考虑最多的是把上海置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坐标中加以比较，观察我们所处的方位，而非名次，客观、准确地分析自身的优势和弱点，从而为我们改进上海教育决策提供依据。上海作为一个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始终关注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同时也特别注重摸索适合自身教育特点的教育政策和改革路径。早在 2000 年 PISA 首次面世后，上海就开始持续关注在 PISA 测试中表现优异的国家 and 地区。上海政府官员、校长多次到日本、芬兰、新加坡等一向表现突出的国家考察，学习他们的教育经验。期间，我本人就曾两次到芬兰做了深入的考察。即便 2009 年 PISA 测试结果公布以后，上海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是依然保持着冷静、客观的专业态度，一如既往地关注着一直处在高位水平上的国家和地区，关注他们的最新教育政策和可能的走向，以为及时调整上海的教育政策提供更多的视角。

不过，我们知道，经验可以学习，但不可以复制。我们在放眼世界的同时，更加强调自身经验的探索、总结和发展。PISA 测试结果，促使上海进一步思考和总结了原有的一些政策和做法。

第一，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旧世纪之交，上海启动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对于欧美国家而言，我们的优势是基础知识扎实、擅于讲授法和进行间接学习。而在这种方式下成长的学生，其创造意识、批判性思维、探索与发现能力比较弱，同信息社会和全球化时代对人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上海的新课程方案，在强调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设置了基础型、拓展型、研究型三类功能性课程。其中基础型课程，着眼于促进学生基本素质的形成和发展，体现国家对公民素质的最基本要求，是全体学生必修的课程。而拓展型课程着眼于培养、激发和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开发学

生的潜能、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和学校办学特色的形成,是一种体现不同基础要求的、具有一定开放性的课程。研究型课程则是学生运用研究性学习方式,发现和提出问题、探究和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自主与创新精神、研究与实践能力、合作与发展意识的课程,是全体学生限定选择修习的课程。三类课程的实施有利于满足学生不同的学习需要,但是课程作为学习的载体和内容,必须使全体学生的学业质量达到基本的水平,即需要制定相应的标准。上海课程改革制订的标准是一份基本标准,它规定了质量的“底线”,是绝大多数学生通过适当努力就可以达到的标准。而对于优秀学生,他们达标后可以进行一些个别化的学习,从而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多样化学习需要。

第二,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学校是课程实施的基本单位,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服务主要通过学校教育作用于学生。学校质量高低,直接影响到公共教育服务的实现程度和教育公平的程度。因此,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首先要办好每一所学校。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地区之间、学校之间,办学质量还存在一定差距。对此,上海采取的做法主要有:一是让好校长领导和管理更多的学校。中国流行一句话——一位好校长能带出一所好学校。好的校长在学校规划、教学与管理、团队建设和处理各种校内外关系上都有很高的水平,这些通常是一所学校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我们做了一些试点,让一所好的学校就近同薄弱的学校形成学校集团(或联盟),让这所好学校的校长统一领导和管理集团(联盟)内的多所学校。上海的很多区都开展了这项工作(如浦东新区的福山外国语小学集团、明珠小学集团、建平学校集团等),实践效果比较明显。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集团(联盟)办学的形式,把好学校和好校长的经验辐射到更多学校。二是推行学校委托管理。政府提供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不可推卸,但公共服务的实现方式可以改革,可以把学校管理这一类专业性的工作交给专业机构承担,从而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效能和资源利用的效率。基于这种认识,2005年浦东新区推出了“委托管理”机制:由政府买单,将薄弱的农村学校,委托给中心城区优质学校或教育机构进行管理。2007年上海在全市推行学校委托管理,即政府委托优质学校或教育机构管理郊区质量较低的学校。郊区农村20所义务教育阶段相对薄弱学校由中心城区的品牌中小学及有资质的教育专业机构进行委托管理,为期两年。经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表明,20所被托学校的面貌发生明显变化。委托管理突破了现行管理体制下教育资源跨区域流动难的障碍,通过团队契约的方式,明确目标、途径、期限和绩效考核方式,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向郊区农村辐射。2009年和2011年,分别又有40余所郊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接受托管。三是城区和郊区结

对发展。2005年,上海9个中心城区与9个郊区县(浦东新区形成区域内城郊学校间的交流互动)签署了“上海市区县教育对口合作协议书”,9对区县本着优势互补、协作互助、改革创新、共同发展的原则,开展为期3年的教育对口合作计划。2008年,签订了第二轮区域结对协议。对口合作交流的实施,使得城区教育支援郊区教育在形式和内涵上都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郊区学校发展。

第三,大力发挥教研制度在普遍提高教育质量和教师专业水平中的作用。如何通过制度性的构建为课程实施和教师发展提供专业的服务?我们的答案是教研制度和教研体系,这是中国的特色。教研室是教育行政部门专门设置的教学指导机构,其担负的主要职能是以课程改革和实施为中心,进行教学研究、指导和服务。在中国,教研制度已有多年历史,而上海是中国最早成立专门教研机构的省级地区。60多年的教研制度推进经验表明,它对于保证基础教育的质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的主要举措是:一是健全三级教研网络,即市、区和学校三级教研网络。市、区教研机构通过质量分析和监测、教学视导和研讨、教学经验总结和推广、教学能力培训和交流等分别对各区域和学校进行引导和指导,对教研员和教师进行业务培训,提升教学水平。通过整个教研网络,为广大教师的课程实施提供专业指导和服务。二是实施校本教研,即开展立足本校需要、在本校开展服务本校教学改进的教研。校本教研鼓励教师以教研组为载体,从课程教材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出发,以研究为纽带,以同伴互助为主要形式,通过专业引领、行动跟进和实践反思来促进自身专业发展,形成扎根于每一堂课、关注每一位教师、促进每一位教师发展的新型教研文化。三是不断转变教研方式。传统教研工作,主要以教研员逐级召开会议,或者现场指导的方式进行。层级式的工作方式削弱了教研员与学校教师之间的信息沟通,影响了指导的效果。我们正在着力架构一个基于现代技术支撑的全市范围的新教研体系,建立基于网络的教研方式,增强教研的实时互动和在线研讨,实现对基层教研的“扁平化”指导,提高教研的有效性。

第四,加强教师继续教育。职后继续教育是教师专业发展的直接和有效的手段。上海连续多年坚持开展教师全员继续教育。当前,教师全员继续教育的实施重心在学校,中、高级职务教师每五年分别必须完成全市规定的“240”、“540”学时培训,其中校级培训的学时比例应高于50%。对校长则开展了校长培养计划、年度暑期校长全员培训计划、赴国外影子校长培训计划等。同时,针对教育相对薄弱的郊区制订教师培训计划,将郊区教师培训放在全市培训工作的优先位置加以规划和落实,投入专项支持经费,支持各郊区县根据当地需要确定培训项目和课程,选择优质培训资源。从市

区选派优秀教师到郊区支教、讲学,从郊区选派校长、骨干教师到市区中小学挂职锻炼,跟岗培训。在资源上,建立了上海教师教育资源联盟。通过购买服务的办法,采取签订合同、自主选学、学分积累、社会评估和根据绩效进行资助等方式,充分调动各类教师教育机构的人力和物质资源。

可能正是这些着眼于全体学生公平接受教育的基本做法,抬高了上海基础教育的底部,进而提高了整体水平。回顾这些经验时,上海在 PISA 测试中取得较好的结果,似乎又不那么令人惊奇了。

就在我们还在讨论 2009 年 PISA 测试结果的时候,2012 年新一轮 PISA 测试已经结束了,2013 年结果很快会公布。哪些国家(地区)会处在第一集团?上海还能保持吗?会不会杀出一匹“黑马”?这些问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参与测试的国家和地区,在 PISA 这个舞台上学到了什么,分享了什么。

透过这本书,我们看到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面对 PISA 的理性思考和进取心态,尽管书中有些观点和结论未必完全符合事实,但做法依然值得尊敬和学习。同时,美国学者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分析,其视角、分析方法及其结论,特别是对上海的分析也很值得我们思考、回味和借鉴。

面对新一轮的 PISA 测试,如果说我们对结果抱有期待,那么,我们期待知道的是在上一轮 PISA 中发现的问题,在过去几年解决得怎么样了?学生在保持学习水平的同时,学业负担有没有减轻?兴趣有没有增加?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水平有没有提高?

愿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不断地实现理想、超越自我。

是为序。

序(二)

任友群

(华东师范大学副书记兼副校长,教授)

在2010年12月世界经合组织公布了PISA 2009测试结果后,上海教育顿时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纷纷在第一时间刊发讨论文章,对上海教育进行解读。其中许多观点,也经国内媒体的转载报道,为我们所熟知。

由于学术研究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学术界相对保守,所以,西方学术界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发布很多有关上海教育现象和原因的系统分析文章。但这并不表示欧美学术界不关注这个问题。相反,对于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之高的教育质量,欧美学术界表现出了极大的研究热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综合之后,欧美学术界目前已陆续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对上海教育的成功经验进行分析总结。最近,在学术意义上比较重要而且有影响力的是2011年在哈佛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题为《超越上海:美国应该如何建设世界顶尖的教育系统》一书。

2011年出版的《超越上海》一书研究了上海、芬兰、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等五个被认为是教育最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对他们的成功经验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总结。《超越上海》这本书由美国“教育和经济研究中心”主席 Marc S. Tucker 主编,世界知名教育研究专家、前美国教育研究协会主席、斯坦福大学教授 Linda Darling-Hammond 撰写序言。

这本书也被哈佛教育出版社作为一本重要的推荐书,放在2012年4月于温哥华召开的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年会书展上予以展出。我在会议期间得到本书,觉得有必要把它翻译成中文,因为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西方学术界是如何理解和学习上海教育的成功经验的。另外,本书除了介绍上海的经验之外,也还介绍了其他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一直以来,我们对国外经验和做法的学习,主要都是由我们国人自己整理的。这次,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些由美国学术界所总结出来的其他国家

的经验和做法,或许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基于此考虑,在联系和谈妥了版权问题后,我就委托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的柯政博士来负责这本书的翻译。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翻译工作已经完成。借此机会,我想谈谈我从这本书中所看到的西方学术界对上海成功经验的分析情况。

对上海经验的分析被放在这本书的第一章,文章的标题是“上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是如何跃居世界第一的”,作者是被称为香港教育界名宿的前香港大学副校长、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程介明博士。除了这一章之外,在《超越上海》一书的序言以及最后的总结篇章中,Darling-Hammond 以及 Tucker 也都对上海的成功经验进行了解读。综合起来看,这些学者认为上海教育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卓越的成绩,最主要的贡献因素或者成功经验包括如下几方面:

◆ 悠久的“重教”文化传统

程介明在描述上海以及整个中国的教育背景时,特别强调了中国“重教”的文化传统。他指出,这种文化传统给教育带来最根本的影响就是,上海或者中国的学生在学习上的投入非常高。上海的学生不仅要在课堂上全神贯注,回到家父母还会要求他们每天晚上做家庭作业,据估计大约有 80% 的父母会把孩子送到校外补习学校去进行考试辅导。他指出,这可能是因为很多中国人都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都想努力地向上爬;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向来就强调勤奋、用功。他认为,这种文化传统给上海教育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比如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但这种文化传统对上海教育的成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 政府对教育高度重视

程介明认为,我们可以从上海经验中推断出来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一套清晰的、雄心勃勃的、且能得到广泛支持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他认为,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人力资本是社会经济发展可以依赖的重要资源,所以对教育非常重视,在教育上做了大量的投资。他说,自上世纪 90 年代,上海市政府就提出“一流城市,一流教育”的口号,致力于追求国际一流的教育质量。尽管对于什么是“一流”还有些模糊,但这个概念的提出还是能够有效地推动教育改革的进程,并让教育改革始终出现在政府的政策日程表中。他也以温家宝总理直接牵头,并最终由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为例来说明中国对教育改革的重视。他认为,政府给教育改革如此强大的政治支持,可以保证教育改革的强大势头,有利于教育从政府那里分配到大量的资源,也有利于教育从社会其他部门获取各种各样的支持。

◆ 关注学生学习的课程改革

程介明在介绍中国和上海教育时,都花了很大一块篇幅介绍课程改革。他说,上海之所以在中国享有“教育改革排头兵”的美誉,主要来自它的课程改革(第34页)。他认为,上海的课程改革主要涉及拓展学生的学习经验,增强学科知识的现实相关性,关注学生的能力发展而不是信息的积累。课程改革是直接关注学生学什么以及怎么学的问题,对学生学习的高度关注,也被认为是上海教育的一个重要经验,上海在理解学生的学习上做出了大量的工作。程介明指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改革之所以低效,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经常在政策和制度的外围用力,很少专注具体的教与学,而在上海的教育改革中,学生的学习是改革者关注的核心内容。

◆ 有一个全面、系统、连贯的改革思路和方案

程介明认为,从上海经验中可以看出有一个全面、系统、连贯的教育改革思路和方案也是很重要的。他总结认为,上海在这方面至少有三点是值得学习的。第一,上海教育改革的内容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只关注哪一方面。例如,虽然课程教学是关键,但如果只改革课程教学,而没有其他方面的改革支持,那要全面、可持续地提升学生的学习也是不可能的。第二,上海教育改革是把学生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来看待的,希望学生在各方面、各层次都得到全面的发展,而不是只关注学生的某些方面。第三,上海的教育改革也不是仅仅局限于教育系统内部,而是致力于动员全社会力量来搞教育。上海提出“一流城市,一流教育”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因为把教育改革作为建设一流城市的内在要求来推进,这样就把政治家、家长、用人单位、媒体以及教育者都卷入教育改革的进程中。

◆ 管理机制的原因

《超越上海》一书的主编 Tucker 说,他们发现所有教育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都有一个具体的政府部门来统一管理中小学教育,而这点在美国是不具备的。他认为,有这样一个政策中心,就比较容易协调教育系统中的各项改革措施,而这些改革措施之间能否协调匹配是决定教育改革是否能够成功的很重要原因。程介明也指出,虽然当前教育文献中充满权力下放、分权等理念,但这是需要做进一步审视的。虽然集权可能不是一个优点,但在权力的集中和分散之间保持一个平衡是很重要的,教育也不会例外。

◆ 教师教育具有优势

Tucker 说,如果把优秀教育体制的特征简化为最重要的两点的话,那么除了教育

系统内部的连贯匹配之外,另外一点就是有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他认为,在教师教育政策上,上海很多地方要做得比美国好。首先,在上海,由于很多教师可以从家教中获取不菲的收入,而且政府对那些愿意去边远地区从教的老师会给予额外的补助。再加上,近年来已经免除师范教育的学费,而且给予那些申请读师范的学生以提前录取的机会,这使得教师职业变得非常有吸引力,尤其是对那些家境一般的优秀学生来说更是如此。其次,中国的教师教育非常强调教师任教学科知识的掌握。他介绍说,在上海,学生在职前教师教育课程中大约 90% 的时间都是用于学习今后从教学学科的知识体系。例如,一个将来要从事数学学科教学的学生,他在大学里需要修习的数学课程,与今后要从事数学研究的学生是一样的。第三,虽然相比芬兰等国家,中国的职前教师教育在教学方法部分训练不够,但上海发明了一套非常好的师徒制来解决这个问题。通常,一个新教师入职后,学校都会给他们配备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处理教学问题,而这种方法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第四,上海的教师有持续的继续教育和专业发展活动。程介明介绍说,上海是国内第一个要求教师进行持续专业发展的地区,政策要求所有教师每 5 年必须参加 240 个小时的专业发展活动。

◆ 中高考的作用

美国学术界也注意到,上海以及中国的很多改革者都把中高考看作是制约学生综合发展的重要障碍,但他们认为,中高考可能是一种“必要的恶”,它的存在还是对上海以及中国学生的学习起着很重要的正面作用。它为学生学习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结构,如果没有中高考,很多学校和学生可能根本找不到学习的方向。Tucker 更是认为,像我们这样与课程标准紧密结合,由外部权威机构出题,成绩直接关系到学生是否能够进入下一阶段学习的中高考制度,是一项非常好的制度。比如他认为,在这种机制下,所有的学生都会具有强烈的动力去修习高难度的课程以及会更加用功地学习。而且,他认为,上海中高考试卷要比美国的许多标准化测验做得更好,因为前者包括许多致力于对学生复杂问题解决的开放题或者短论文,这更有利于测量和评价学生的高级思维能力,而后者常见的就是单项选择题。

在阅读和梳理《超越上海》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美国学术界对上海教育成功经验的分析过程中,我得出了如下三点认识:

◆ 收集、研究别人对我们经验和问题的分析很重要

上海在 PISA 测验中取得出色成绩之后,国内学术界对于今后的教育改革出现了

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个结果充分说明,我们许多传统做法远不是之前很多人所想象的这么落后,而是具有很大的优势,所以今后我们的教育改革要特别慎重,不要把我们传统做法中的许多精华当作改革对象而丢弃掉。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上海教育能够取得今日这个成绩,正是由于我们不断地改革传统做法而取得的,现在的结果也证明了之前改革完全是正确的,接下去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

很明显,这个争论的背后,事实上就是怎么理解上海教育的成功经验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如果我们不把它搞清楚,我们后面的改革就很可能是盲目的、“碰运气”的。而要准确地把握这个问题,了解和研究其他国家学术界是怎么来分析这些问题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兼听则明,多了解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所作出的分析,对我们更好地定位自己很有裨益。所以,今后上海除了要继续收集、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理念和方法之外,还要认真系统地去收集和 research 其他国家对我们自身经验和问题的分析。

◆ 有些问题他们比我们自己看得还深刻

比如,他们在解释为什么上海会从建设世界一流城市的高度来定位教育,以及为什么上海教育改革始终关注学生学习时,就推测上海已经准确地认识到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所有能够程式化的工作都可以被计算机或者能够承受更低工资的工人取代,而要获取高收入就必须具备高度的创造力以有效解决各种复杂问题,所以未来的公民都必须掌握在之前可能只是部分优秀学生需要掌握的高级知识,比如批判性阅读能力、综合问题分析能力等,而一个城市要保持竞争力,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让大众都达到之前精英教育水平的教育标准。可能,我们很多教育改革者事实上并没能看得这么远,但他们这种分析却是到位而且是高屋建瓴的。

又如,他们在说上海在理解学生学习上做出了大量工作的时候,指出我们要有一大批研究学习科学的学者。尽管在事实上,我们严谨地从事学习科学研究的学者并不多,但他们准确地看到以促进学生学习为核心的教育改革,需要更多的学习科学的支持则是有远见的。这也提醒我们需要在这些方面花大力气去加强建设。除此之外,他们对中高考、教师教育制度等分析,也有许多有别于我国主流认识的独特见解。

◆ 他们对我们的情况也存在着一些想象的成分

与我们对国外情况的介绍分析一样,美国学术界对上海教育经验的介绍分析很多也带有想象的成分。比如,他们认为包括上海在内的这些教育做得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在教育经费的分配上一般都是公平地分配到各地区各学校,而不是像美国那样

贫富悬殊。又如,他们提到上海的外部考试是少而精的,而不是像美国一样在很多年级都搞大范围测试。还有,他们认为我们在学生全面发展上做得不错等等。显然,他们这么说可能更多地是出于理论自圆其说的需要,有意无意地对我们的实际情况进行裁剪。因此,我们在分析他们的这些观点时,不能一听到他们说我们好的,就不加批判地接受它,而一听他们说我们不好的,就想方设法寻找反例来反驳批判它,而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他们的分析进行细致严谨地分析,提取其中有价值的部分,为我所用。

本书的出现意味着上海教育乃至中国教育正在成为国际主流教育研究界的一个关注点,而且这种关注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会越来越强。上海既应该继续坚持在教育改革上的探索,也应该加强对我们自身经验的总结。我们可能应该开始习惯在国际关注下推进我们教育的改革,同时,我们越来越需要高质量的教育研究,需要在国际学术界有话语权的研究。

是为序。

中译本前言

Marc Tucker

(美国全国教育与经济研究中心主席)

几年前,我的一个好朋友向我建议,叫我去读一读马立平(Liping Ma)写的一本书——《小学数学的掌握和教学》(*Knowing and Teaching Elementary Mathematics*)^①。他说,看了这本书绝对不会后悔。他说对了。这的确是我所读过的有关教育的最好的一本书。在这本书中,马立平比较了中美两国在基础数学教学方面的异同。马立平对中美两国的教育都非常熟悉,所以,她来做这个事情是非常适合的。马立平在文革期间从大城市被下放到农村,在那个村里,村民们给她分配的任务是教书,因为当时她是那个村少有的知识分子。在文革结束后,她到中国西部一所师范院校读书,拿到了师范文凭。后来,她想方设法来到了美国,在密西根大学拿到了教育领域的高级学位,最后也留在了美国做教育研究。

那本书说起来非常简单,就是一页接着一页地比较中美两国教师,在向同一个年级学生教授同样数学内容时所采取的方法有哪些异同。但比较的结果非常令人震惊。中国教师在教学中非常关注概念,确保每个学生都能真正理解内容背后的数学概念。这样,学生就有可能采用多种方法来解决某个特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教学方法为学生学习更高深的内容以及运用现有知识来解决真实世界问题,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而美国教师做法则是相反。他们向学生传授的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具体办法,而不告诉学生这些解决策略背后的概念。由于学生实际上并不了解为什么要用这些解题方法,所以他们在那些诸如代数等对原理性概念有很高要求的数学内容时就会感到很困难。而且,当学生们在遇到一些与教科书上的问题不大一样的真实现实问题时,就会觉得不知所措。

① 本书中文版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所以，当我有一次有机会在中国的一些学校里待了几个星期，看到很多中国数学教育情况时，我并不感到惊讶。我发现，即使在中国西部的一些农村学校，他们的数学教育看上去也是做得非常好。他们的学生在做一些在同年级的美国学生看来是比较难的数学题目时，看上去也是感到非常开心和适应。

就在几年前，我跟我的一个朋友（他当时是香港考试及评核局的负责人）聊天。当时，中国（上海）已经正式同意参加 PISA 的测试，所以我就问他，中国大陆的教育怎么样。他说，他们香港教育界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大陆的一些沿海城市在数学教学上可能会超过香港。而在当时（现在也是），香港在教育上是世界最好的地区之一。

而正如我们现在所有人都知道的，实际情况确实是这样。

所以，所有人都想知道，中国人是怎么做到这点的。现在，教育部以及其他部门对那些国家在基础教育方面做得最好，以及如何尽可能地从这些国家中学习到相关经验，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在过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军事上的。而现在，国家一般是通过贸易以及发展本国经济生产力等方式来改善、提升本国居民的生活条件，而不再是通过征服他们的邻居，占用别国的土地来实现。每个国家都认识到，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关键都是要依靠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现在，任何想长期执政的政府或党派，都必须想方设法给本国的公民提供尽可能好的生活条件，而任何想这样做的国家都必须思考怎么样去建设一套世界一流的教育系统。毫无疑问，相比以前，现在我们更为关注教育，也更积极地向其他做得好的国家学习怎么办教育。

虽然在最近几十年的学生学业成就国际比较中，美国学生的表现都相对比较差，但我们部分政府官员却很少有兴趣去学习其他国家是怎么教育孩子的。不过，在三年前，这种不喜欢学习其他国家的状况开始改变。当时，美国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请总部在巴黎的世界经合组织（OECD）准备一份报告，告诉美国那些教育做得最好的国家都采取了哪些措施。OECD 又转而要求我们这个机构——总部在华盛顿的全国教育和经济研究中心（NCEE）来准备这份报告。一年后，我们对这份报告进行了微调，使它更适合一般读者阅读，然后请在哈佛大学的哈佛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这样所有对教育上做得最好的国家一般都是采取哪些改革措施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全世界各地读者都有机会看到它。于是，就有了本书。你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本书的中文版。

看到这本书能够被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的读者，我感到非常开心。你们在教育